

走出高等教育原著与译著错位的困境

——兼评译著《高等教育的日本模式》

李 泉 鹰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中图分类号: G649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000-4203(2008)09-0106-04

高等教育问题不能在产生它的环境中自然地得到解决,它不仅依赖于高等教育实践的改革,也有赖于高等教育理论的创新。高等教育理论创新与高等教育实践改革是彼此密切联系着的,前者来源于后者,同时又为后者而存在,即高等教育理论指导高等教育实践,又不断地在高等教育实践中提升自己的品格。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不仅存在实践改革乏力的问题,同时也面临着理论创新不足的困境,而后者似乎比前者更为严重。因此,究竟如何求得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的重大突破,引领高等教育实践改革走出困境和突出重围,日益成为一个备受关注而且论争颇多的话题,而论争的焦点在于如何处理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的关系。从论争的过程与结果看,不管双方的观点如何对立,彼此几乎都认为高等教育理论创新不可闭关自守,要有国际视野与战略思维,要善于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高等教育理论成果;无论是高等教育理论先进国家还是高等教育理论落后国家,都应学会如何吸收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理论的合理内核,以便快捷地实现本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创新。那么,究竟如何便捷地达到这样的目的?人们比较一致的答案是:阅读外国的高等教育名著。然而,并非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或有能力直接阅读外国的高等教育原著,往往只能阅读它们的译本,从而间接地达到从中吸取养分的目的。照

此而论,专门的翻译便成为国际间高等教育思想或理论相互传播和交流的关键,同时也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神圣事业。

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和认识,我国高等教育界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甘愿为高等教育研究做“嫁衣”的默默翻译者。近30年来,他们翻译了不少外国高等教育名著,丰富了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园地,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比如,我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王承绪先生领导的原杭州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就比较系统地研究国外高等教育的理论,并联合原杭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组织翻译了《高等教育哲学》([美]约翰·S·布鲁贝克著)、《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美]伯顿·克拉克主编)、《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加]约翰·范德格拉夫等编著)、《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美]伯顿·克拉克著)、《大学的使命》([西班牙]奥尔特加·加塞特著)、《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美]亚伯拉罕·弗兰克斯纳著)、《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美]伯顿·克拉克著)、《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研究基础》([美]伯顿·克拉克主编)、《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美]德里克·博克著)、《大学的理想》([英]伯顿·

收稿日期:2008-08-17

作者简介:李泉鹰(1973—),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研究生,广西民族大学发展规划处副研究员,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亨利·纽曼著)、《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美]克拉克·克尔著)、《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荷兰]弗里斯·F·范夫格特主编)、《美国高等教育》([美]罗伯特·M·赫钦斯著)等西方高等教育名著,并冠名为“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这套“丛书”从不同维度介绍了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历史、作用、职能、理念、体制、政策及其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等,对我们研究外国高等教育具有特殊的意义。但美中不足或令人遗憾的是,这套“丛书”选择的几乎都是欧美学者撰写的高等教育名著,鲜见有亚洲国家学者撰写的著作。虽然厦门大学的陈武元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翻译过日本学者关正夫的《日本高等教育的改革动向》,此书较系统地介绍了日本战后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最新的改革情况,内容涉及日本高等教育的主要方面,为我国学者研究日本高等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但总体看来,国内有关日本高等教育的译著还不多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一片空白。令人欣喜的是,陈武元先生于2006年翻译出版的《高等教育的日本模式》,填补了这一空白,弥补了这一缺憾,再次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日本高等教育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

《高等教育的日本模式》是日本著名教育社会学家和高等教育学家天野郁夫先生的代表作。天野先生被誉为“日本高等教育研究第一人”,他的许多著作被列为日本各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方向研究生的必读书目。目前,他的多篇论文已被翻译介绍到我国,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有广泛的影响。《高等教育的日本模式》作为“天野先生从教育社会学转向高等教育研究的第一本著作”和“确立他在日本高教学界地位的标志性成果”,同时作为他的第一部被译成中文的高等教育学术著作,历经10年才圆满完成。正如译者陈武元先生所言:本书从历史和国际比较的视角对日本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是一部全面了解日本高等教育发展史的重要著作。从译本内容和结构体系看,《高等教育的日本模式》全书包括八章:第一章,引论: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学说与制度类型论;第二章,旧制专门学校:高等教育机构雏形的建立;第三章,高等教育机构的设置认定与标准判断;第四章,地方国立大学的建立与发展;第五章,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与模式;第六章,高等教育制度论:日本模式的摸索;第七章,大学分类论;第八章,日本模式的变化。从具体的内容来看,“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与模式”、“高等教育制度论:日本模式的摸索”等专题研究,对当

下正处大众化过程中的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与借鉴。众所周知,我国高等教育自1999年开始大规模扩招,2007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23%。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张使得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这些变化给高等教育的研究者和行动者提出了全新的课题。当下人们比较关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构建起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高等教育系统,以确保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日本与中国同属亚洲国家,彼此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又同属于高等教育“后发外生型”国家,因而日本的高等教育特别是二战后几十年的高等教育发展经验,对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改革与发展具有无可置疑的“借鉴”或“预警”意义。事实上,这也正是陈武元先生高度关注日本高等教育,并首先选择翻译此书的主要目的所在。

《高等教育的日本模式》是一部融高等教育理论与高等教育方法于一体的学术力作。天野先生娴熟地运用历史和国际比较的方法对日本高等教育进行了深入研究,展现了高等教育历史研究和国际比较研究的独特魅力,树立了如何运用该研究方法的典范,对我们研究高等教育具有特殊的方法论指导意义。大家熟知,方法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它与科学研究共进,所以方法的选择对科学研究至关重要。具体言之,科学研究依赖于研究方法的发展与选择,研究方法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具体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影响着科研结论的客观性与科学性。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形成于过去,汇聚于现在,又奔向未来,永远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因此,如果我们不对高等教育的历史进行考察,就难以理解高等教育的现在,更不用说高等教育的未来了。尽管如此,我们不能作历史材料的奴隶,必须懂得如何在浩瀚的高等教育世界里去选择研究素材,确保所挑选的素材对我们的研究是最有意义的。《高等教育的日本模式》可谓是从历史的视角研究高等教育的经典之作,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将目光主要投向日本近百年最重大的高等教育事件,同时也没有忘记挖掘那些特殊的教育现象或教育事件背后所隐藏的意义与价值。比如,“高等教育机构的设置认定与标准判定”原本是一个不易阐释的命题,但天野先生另辟蹊径,通过《专门学校令》和《大学令》的解读而将此问题解释得一清二楚。单从这一点看,《高等教育的日本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进行政策文本解读的范例。另外,大凡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探讨都具有寻找坐标系或参照系的显著特征,而要找到合适的参照系就不能没有国际

视野,尤其是高等教育后发外生型国家惟有先学别人,然后才能超越别人,最终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模式,进而再成为别人的参照系。《高等教育的日本模式》一书无疑展现了这一思维路径,整个研究基本上是在与美国、欧洲国家比较分析的框架下展开的,彰显了国际比较之于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揭示了高等教育理论创新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真谛所在。本人认为,这是我们阅读此书时应该深刻把握的,也是此书慷慨回赠于细心读者最有价值的东西之一。

《高等教育的日本模式》一书体现了天野先生求真务实、十年磨一剑的科学精神。作为日本当今最著名的高等教育学家之一,天野先生的成功虽与他所处的特殊环境分不开,但更与他个人的不懈努力和他那坚忍不拔、忠于真理的科学精神分不开。众所周知,从事科学研究不能没有崇高的科学精神。换言之,一个人只有具有忠于真理的崇高的科学精神,才能最终攀上科学的顶峰。日本广岛大学的喜多村和之先生认为,研究高等教育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尤其强调把美国高等教育作为比较研究对象的重要性。深受他的启发和影响,天野先生利用20世纪70年代初在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机会,专心研习美国的高等教育。据天野先生回忆,当时的研究条件非今日所能比,别说一体化的办公设备,就连一台专用的打字机也没有,所有的资料查阅和记录全靠手抄。就是在这样极其简陋的研究条件下,天野先生通过记读书笔记和用小卡片记录资料,依靠顽强的毅力和对科学研究的执着,完成了今天在现代化的研究条件下许多学者都无法完成的课题研究。从《高等教育的日本模式》一书的内容来看,第一至第六章的研究成果都完成和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足见天野先生在当时的研究条件下取得的成果是丰硕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天野先生对科学研究的执着追求。令我们感到极为震撼的是,本书完成的时间跨度长达10年,可谓十年磨一剑。难怪在阅读它时,我时刻都有一种理论与知识的厚重感。

《高等教育的日本模式》无疑也是一部特别好的“译著”。作为译者陈武元先生的师弟和好友,我有幸在第一时间获赠此书,并在第一时间拜读它。毫不夸张地说,此书给了我许多的震撼和持续不断的兴奋,让我当时就有了一种强烈的“相见恨晚”之感,而今天再次拜读它,无形中又增添了一种“故友重逢”的喜悦。为此,我再也无法说服自己不向大家推荐此书,并阐发自己的肺腑之言。虽然这一切看起来有点像“一段迟来的告白”,但它犹如陈酿的美酒,

储藏的时间愈久愈加醇香可口。说实话,最近6年,本人利用读硕士和博士的机会,拜读过大部分能找到的高等教育译著,感觉除了少数译著外,大多数译著总难免给人一种美中不足之感,根源在于这些译著读起来实在有点费劲,经常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猜测和理顺文中之义。与此截然不同,我读《高等教育的日本模式》的译本却感到非常轻松,毫无阅读多数译著时的那种晦涩之感,它让你感到是在阅读地道的中国著作。此书出版不到一年,就畅销完毕,现已再版,我想除了原著特有的魅力之外,无疑与译著的质量存有莫大的关联。

译好一部名著绝非易事。我虽然不是《高等教育的日本模式》一书翻译的全程见证人,但我目睹了“翻译”的后期工作,而且有大量的机会聆听陈武元先生翻译此书的许多“传奇故事”。在我看来,“反复研读原著,不厌其烦地字斟句酌于译文”可看成是此书翻译过程的真实写照。说句实在话,我曾与许多人一样,对翻译有过这样或那样的误解和偏见,以为那是一件不怎么费劲的轻松事,考验的只不过是一个人的外语能力而已。但是,真实情况并非如此。通过拜读《高等教育的日本模式》,加上与译者频繁地接触和交往,我发现做好翻译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简单。翻译好一本著作,不仅需要译者有精湛的外语能力,同时也要求译者具有扎实的中文功底,还要求译者具有广博的知识储备(尤其是相关学科的知识储备至关重要),并对原著有良好的把握。如果译者仅有超强的外语能力和汉语能力,而对原著的作者以及该作者所在国家的文化不熟悉,又缺乏相关学科的知识储备,那是很难把握原著的精髓的,所译著作也难免给人一种“云里雾里”之感,置读者于难以脱困的“文字迷宫”(陈武元先生曾经坦言,如果不是在厦大高教所从事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多年,如果没有到日本做访问学者的经历,如果不是翻译天野郁夫的著作而换作其他陌生作者的著作,他也没有十足的信心把它翻译好)。用翻译界的行话说,要做到让目标语言的读者和源语言的作者能够顺畅地交流,译者必须把握源语言文本的核心含义,然后再用一种全新的文本即目标语言文本重新表达和呈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再创作”,而不是一种机械地再现。正因为如此,一部好的译著,它的价值一点也不逊色于原著。

当然,光有上述所言的这些似乎还不够。要真正译好一部作品,译者还必须有全心全意为他人做“嫁衣”的奉献精神。借用陈武元先生的话说,要成为一名好的翻译者,心中必须始终装着两个人,一个

是作者,一个是读者,惟有如此,才能译出好的作品,翻译也才能成为受人尊重的神圣事业。不由分说,陈武元先生就是这样的译者,心中时刻装着作者和读者。不然,我们就很难理解,《高等教育的日本模式》早在2002年就已经翻译完,但一直到2006年才出版,历时整整5年,与天野先生用足足10年时间才完成原作,可谓是旗鼓相当。据我所知,在这5年时间里,最初的译稿并非搁置在那里,而是译者的无数次校对和修改。当我探问陈武元先生为何如此认真,他说想尽可能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地道的汉语将原著的本意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力求既做到翻译不走样,又能让国内读者看得明白、读得轻松,尽量少给翻译界留下遗憾。与此同时,陈武元先生还强调,翻译作品要有足够的耐心,要做到不厌其烦地反复雕琢自己的作品,不然的话,要求他人欣赏你的作品就毫无道理,也没有任何理由。因此,在我看来,与天野先生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相比,陈武元先生对翻译所持有的崇高使命感和高度负责的品德,一点也不逊色。

正是基于如此种种的缘故,作为国内研究日本高等教育的青年专家,陈武元先生深受天野郁夫、有本章、金子元久等日本著名高等教育学者的尊重和信任,并能与他们相知相交。据悉,天野先生已再次将《高等教育的日本模式》的姐妹篇《日本高等教育

系统》授权于陈武元先生翻译,并在此书的中文版序中毫不避讳地写道:“本书的翻译仍由厦门大学陈武元教授承担。陈武元教授在日本高等教育方面有深厚的知识,而且精通日语,能够再次拥有这样的翻译者,对作者来说,是一大幸事。在此,向繁忙中拨出宝贵时间于回报少、并且需要耐性的翻译工作的陈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希望本书与前面提到的书一样,能为更多的读者所喜欢。这对陈教授的辛苦或许是最好的回报。”据我所知,《日本高等教育系统》一书已于2005年完成译文初稿,现还在校对和修改中,我们期待它能尽快面世,同时我也殷切地期望自己能够再次在第一时间拜读到武元兄的新作。

总而言之,《高等教育的日本模式》是一部原著与译著都闪烁着智慧之光、渗透着崇高的科学精神的好书。它是这样的一本书,慷慨地回报每一位细心的读者,让我们去重读,去追问,去反思,去研究,去品茗。它是这样的一本书,让我们感悟到的不只是精湛的高等教育理论和先进的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还有难能可贵的求真求实、坚韧不拔和“文章不写半句空,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科学精神。

(本文责任编辑 许宏)

(上接第89页)

- [11] 王沛,杨金花. 大学生职业决策和自尊、成就动机的关系[J]. 心理发展与教育,2006,(1):52-57.
- [12] 张娜,赵丽丽,王大华等. 幼师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学校适应与职业犹豫不决之间的关系[J]. 心理发展与教育,2007,(4):22-26.
- [13] K M TA YLOR, J Popma.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career salience, locus of control, and vocational indecision[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1990, 37(3):347-359.
- [14] M RODRIGUEZ, D BLOCHER. A comparison of two approaches to enhancing career maturity in Puerto Rican college women[J].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1988, 35(3):275-280.
- [15] LUZZO A DARRELL. Effects of verbal persuasion

- on the career self-efficacy of college freshmen[J]. *California Association for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1994, 14(1):31-34.
- [16] 沈之菲. 生涯心理辅导[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160-162.
- [17] ROBERT D LOCK. 把握你的职业发展方向[M].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6:10-21.
- [18] 李斌,王欣. 职业生涯团体心理辅导对女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影响[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6, 20(11):765-767.
- [19] J GBORKOWSKI, R WEYHING, M CARR. Effect of attributional retraining on strategy-based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 learning-disabled student[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88, 80(1):46-53.

(本文责任编辑 许宏)